

日常·乡土·两岸情：缘于积极人生观的“正能量”书写

——周啸虹创作特点管窥

朱双一 肖魁伟

摘要：周啸虹不写达官贵人，却写出了日常生活中人生的百态，其笔下的“平凡人”总是那么笃定、坦然，显示出平凡中的伟大。浓郁的乡土色彩使人相信“乡土”并非本省籍作家的“专利”，相较之下，其作品较少悲情描写，显得更积极向上，深具人情味和爱心。“解严”后大量老兵探亲题材创作常将其当作“伤痕文学”来写，铺陈乃至夸大大陆之负面现象，周啸虹却以亲身经历为基础，写出了两岸同胞亲人之间的相互包容、谅解和友爱。作品的幽默基调既来自灵动有趣的文笔，更须有作者自身宽厚、乐观的内在性情作支撑。这种侧重于书写、彰扬“正能量”的风格特点，缘于积极的人生观，与作者历经战乱，漂泊坎坷，而后进入相对承平年代而产生的感恩、知足心态有关。

关键词：周啸虹；“日常”描绘；“乡土”抒写；幽默基调；“两岸情”叙说；“正能量”书写

中图分类号：I207.4 **文献标识码：**A **文章编号：**1008—0163(2014)2—0065—05

DOI 编码：10.3969/j.issn.1008—0163.2014.02.013

周啸虹先生的著作，除了大陆出版的《逝水》、《迢递归乡路》等选集外，在台湾还有《悲欢岁月》、《三十功名尘与土》、《马祖·高雄·我》、《归乡拾梦》、《国剧创作剧本》、《周啸虹自选集》、《周啸虹短篇小说选》等等，并有与人共同主编的《地域文化与两岸文学》研讨会论文集，其总字数以百万计。然而这些远非周啸虹一生著述的全部，他的早期作品大量散佚于 20 世纪 50、60 年代的报纸刊物中。我们在翻阅五六十年前的台湾报刊时，不时可以看到周啸虹先生的作品，深感周先生在 1950 年代就是一个很活跃的多产作家，而且他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水平，像症弦策划出版的《联合报》副刊三十年文学大系，里面收录周啸虹的作品就有好几篇，是被收录比较多的作家之一。我们无论是对其早期散佚作品的搜集和整理，或是对其创作的整体阅读和研究，都还有待加强的巨大空间。这里仅根据我们阅读过的作品，就其创作的显著特点，谈一谈自己的感想和体会。

一、不平凡的“日常”描绘

主要集中于普通、日常生活的描绘，是周啸虹作品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。他的作品从来不写高官显贵，英雄豪杰，甚至也不写贵妇人、娇小姐，或高级知识分子，而是写中下层的普通、一般的民众，亦即“小人物”，诸如乡村教师、家庭主妇、普通公务员、小商小贩、邮递员、退役军人、渔民、农民等等。这些人和我们并无多大区别，感觉上他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同样要面对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等问题，有着同样的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。他们面对的生存问题并不轻松，却那样的笃定、坚强、踏实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，生儿育女，延续着社会的生命力。作者没有一味歌颂、赞美，而是经常采用一种平实的、甚至有点调侃或自嘲的笔调。像小说《逝水》中有位“小田”，到年老退休时人们还是叫他“小田”，这一称呼既亲切，又带点无伤大雅的淡淡的揶揄，而我们自己的工作单位中，也经常有类似的“小陈”、“小

季”，其情境几乎一模一样。但是即便作者用这种平实的笔调记录了平凡人的平凡生活，读来却让人感受其中有着某种“不平凡”的伟大。像《山中假期》中的士俊，放弃美好的前程，选择到偏远乡村担任一名乡村教师；《最后五分钟》中种植橘树的果农老马，于无比困顿中选择数年的坚持，最终获得丰收；《长明灯》中孤寂的灯塔守夜人阿元伯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坚守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，为的是给来往的航船指引方向。上述《逝水》中的“小田”当屋外有人叫“老田”时，他笑笑对儿子说，这是叫你的，因为没有人叫我“老田”，都是叫我“小田”。这是多么的笃定、坦然和可爱！周啸虹作品中处处可见这样人物，他们没有丰功伟绩，也不见轰轰烈烈，却都是生活在我们当中的既平凡又伟大的英雄。

周啸虹不写达官贵人，却写出了人生的百态，他的取材非常广泛，涉及面很广。从大的方面来讲，像《爬梯的人》写政客为了达到竞选目的，不惜玩弄各种手段来获取选票，涉及到政治问题；《气球》和《票友记》分别写地产商和股票投机商的发财和破产，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；《折翅》写海外留学生身处异国，面临文化巨大差异所带来的种种格格不入，最终选择返回故土，涉及到文化问题。从更细致的层面讲，作者的创作主题涵盖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等方面。比如，“衣”的方面，《归帆寻梦》写对唐装与棉袍的看法；“食”的方面，《市场内》写的是台湾的菜市场，《旺伯的担仔面》、《十年》写的是台湾的传统夜市，而《江南小吃》、《再谈江南小吃》、《一尝石家肥肺汤》等谈的都是大陆江南一带的精致美食；“住”的方面，《购房记》、《租房子》触及普通老百姓的住房问题，《人蟑大战》、《阳台上的绿意》、《后院那棵杨桃树》写的是家居环境等等；“行”的方面，《轨迹》着笔于台湾铁路变迁的历史，《银翼与蓝天鹅》叙写作者驻防马祖时的海陆运输情况。以旅游为题材的就更多了，《迢迢归乡路》一书中有《神州履痕》、《宝岛行脚》等两辑分别记述在大陆和台湾的旅行。此外，《总干事与我》、《证婚趣事》涉及婚丧嫁娶诸事宜，延伸到家庭子女的养育；《陪考记》、《陪考十七年》、《父子两封信》写的是孩子的升学与成长；《茧》、《路》等更关注社会上频繁出现的青少年问

题。至于《玉佛记》等一批有如司马中原、段彩华以大陆原乡为背景的乡野传奇式作品，非常生动、有趣，虽说带有“传奇”色彩，却反映了广大民间的风俗、信仰情况。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周啸虹创作的日常性和草根性的特点。

进一步言，周啸虹创作题材涵盖全面，简直就是一部日常生活百科全书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画面。这样一个广阔的、不断流动的历史画面，由芸芸众生及其平凡的日常生活所构成。这让人想起一句真理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，周啸虹在其数十年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体现了这一真理。着笔于“平凡”而体现出“不平凡”，这正是作家周啸虹的高明之处。

二、不一样的“乡土”抒写

“乡土”是阅读周啸虹作品时会涌上脑海的另一关键词，或者说，浓郁的乡土色彩是周啸虹创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。我们之所以特别拈出“乡土”这个词，是因为周啸虹作品中，有太多地方能引起与19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联想。他也曾在《三逢文抄公》一文中谈到大概是自己的作品“有点乡土味”而符合当时的潮流，致使作品常被人抄袭^[1]。周啸虹乡土题材作品数量颇多，如《木瓜》让人想起王拓的《金水婶》，写的都是儿女进城后，乡下父母来到城里找他们遭受冷遇、拒绝的事情；《往事》让人想起王祯和的《嫁妆一牛车》，只是一个是一辈子想要有一驾自己的牛车而不可得，而另一个则是想要有一条自己的渔船而无法实现；《绿》中的人物坚持不卖地给商人，《夕阳伴我归》写青年踌躇徘徊，最终决定离开城市返回家乡，其中一位家乡姑娘的爱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这让人想起被称为战后第一代农民作家的郑焕的作品。又比如，《悲欢岁月》写一个戏班的沉浮挣扎，类似题材的作品有洪醒夫的《散戏》、陈若曦的《最后夜戏》等。还有《这条牛》，台湾乡土文学写买牛卖牛的很多，“牛”几乎与“土地”同为最常见题材之一，像洪醒夫、廖蕾夫、黄春明、林双不、谢霜天等，都有此类描写。由此可见，周啸虹小说的很多题材和主题，也就是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常见题材和主题。这说明，“乡土”绝不是台湾本省籍作家独享的“专

利”，外省籍作家同样能写出紧密反映台湾乡土生活的作品。

不过，周啸虹的“乡土”抒写，却还是有与一般作家“不一样”之处。这“不一样”，正是周啸虹创作的特点。相比之下，周啸虹的作品较少意识形态的批判，显得更为积极向上，更具人情味和爱心。像洪醒夫《跛脚天助和他的牛》、廖蕾夫《隔壁亲家》等写农人卖牛，先是舍不得卖，但又不得不卖，或是价钱太低，没卖成，但牛最终却病死、累死了。而周啸虹的《这条牛》则写得很有趣，不那么哀苦、悲情——他设计了一个家庭“民主投票”的细节，以及老牛被牵往屠宰场时，看到田里的耕耘机，就停下脚步不走，说明牛是有感情和聪明的，最后牛被牵回来，结局是好的。又如，洪醒夫写的是悲壮的“散戏”：歌仔戏团受到流行歌舞的冲击而难以为继，大家不愿同流合污，决心好好演完最后一场戏而后散伙。而周啸虹《悲欢岁月》中的女主角却是决心坚持下去，表示要永远认同于戏班，其结局显然更光明些。此外，周啸虹还经常写乡土人物经过奋斗而获得好结果的故事，如《最后五分钟》的果农经过五年的坚持，最终得以摆脱贫困；《阿进婶的猪》写养猪妇把猪当作自己的儿子来照料，在评比中获得了第一名；《绿》写土地面临厂商侵吞的老农民，不屈不挠，最终通过法律途径赢得官司。也就是说，与当时大多乡土文学作品相比，周啸虹的作品显得更为积极、正面，较少悲情、哀苦的描写，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精神。

周啸虹作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特点，除了作者的固有性情外，大概还与其人生经历有关。周啸虹出生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的第二年，历经八年抗日战争、三年国共内战，以及夹杂其间的军阀混战、日军扫荡、土匪骚扰抢掠等等，作者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饱受离散漂荡之苦。1949年局势遽变，年仅17岁的作者孤身离家逃难，漂泊至台湾，举目无亲，随后在军中服役近十年，即便在军中也是居无定所，不断移防调动，可谓饱尝颠沛流离之苦。套用一句现在常用的话语，周啸虹的作品比较侧重于书写、彰扬“正能量”，而这与作者历经战乱，漂泊坎坷，然后进入相对承平的年代而产生的一种感恩和知足的心态有关。

三、与众不同的“两岸情”叙说

“两岸情”的叙说，也是周啸虹创作的一个很有特色的部分，值得特别加以关注。其中一部分以大陆迁台人员（包括军人和平民）为叙写对象。对于此类题材，其他作家常将其涂染得较为灰暗，要么写所谓“国恨家仇”，要么写抛家别妻、流落台岛、孤苦无依，充满消极悲观的情绪。周啸虹却反其道而行之。虽然他有时也写落魄浪子之类人物，如《老郑》，但老郑的悲剧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其自身性格的缺陷——他先因贪污被开除，后来谋得一份稳定的教职，却因公子哥儿性情屡教不改，终被解聘而流落街头、意外身亡。周啸虹的此类题材作品大多充满了光明、积极的色彩。比如《炉边日月长》中的老薛，抵台之初混迹浪荡，因交友不慎将钱财耗尽，接受教训后，来到台南为生计拼搏，兢兢业业，所卖家乡烧饼供不应求，娶的妻子也很踏实，两人携手共建美满家庭。到最后，卖烧饼已经不光是做生意，而是以饼会友，成为一种生活的乐趣。另一作品《大饼》也有相似的旨趣。《曲终》则写一个科班出身的老生，倒嗓后只能跑龙套，但对艺术仍是一往情深，并希望能从“三旗”而有所提升，可惜没有抓住机会。周啸虹写这些人物总是对生活、对未来有所希望和追求，而这才是他们真实的人生。应该说，1980年代以来书写“老兵”的大多是外省第二代作家，但他们毕竟并非亲历，隔了一层。周啸虹却是以外省第一代的亲身经历来写，因此更为真实，更能真切展现其内心世界。

周啸虹的另一部分作品则是写开放探亲后，老兵返乡所发生的事情。此类作品周啸虹更有自己的特点。一般同类题材作品时常将其当作“伤痕文学”来写，比如写大陆人士向台湾回来的亲友诉苦，或贪图台湾亲友的钱财物品；也有写台湾老兵因大陆原配的问题而与台湾太太发生严重冲突；此外还经常写大陆干部的一些形式主义的、似乎带有统战目的的做法。其实很多台湾作家并未真的来到大陆的现场，而是靠道听途说或随意想象。周啸虹与众不同，他以亲身所见所闻为基础，书写两岸亲人在会见后的真实境况。如《遗恨》一改同类题材作品总是写老兵的大陆原配与台湾妻子之间的矛盾，反而写大陆的原配

如何善良淳朴,明事理、晓大义,关心先生在台湾的家;台湾的妻子也主动返乡,与大陆原配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另有《补天》涉及老兵的大陆原恋人和台湾妻子的问题,也是一反矛盾难以解决的常见格局,改以延续了两代人的恋情的情节:青梅竹马的一对恋人因为战乱而分离,一隔四十年,男的在台湾另娶,女的在大陆也他嫁,但两人的后代却谈起恋爱,成就了一段两岸的婚姻,并认识到不要叫“大陆妹”,而要叫“大陆姑娘”。《超生之后》微微地讽刺了大陆在计划生育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作风,但所有干部并没有恶意,只是必须按“规定”行事,当超生的于来旺能够自圆其说地讲出超生的“理由”时——自己残废,需有人搀扶着上澡堂,总不能叫闺女扶,需有个男孩——也就敷衍过关,皆大欢喜,干部还反过来说“谢谢”。《复活的滋味》写台湾派到大陆的人员(国特),偷渡到大陆一上岸就被捕,四十年后偷渡回台湾,却因找不到原来的档案,被当作非法偷渡者再次遣返,则涉及了台湾本身的问题。

周啸虹的此类作品很特别,在当时大多作品极力铺陈乃至夸大大陆之负面现象的流行风气中,是一异数。不仅如此,周啸虹还经常反过来写台湾也有的一些负面的现象,大陆方面也有许多正面的东西。在周啸虹笔下,两岸同胞、亲人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,能够相互包容和谅解。值得指出的是,这些描写之所以感人,乃因它们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,细节和用语妥恰自然,毫无疏隔、生硬之处,即如“超生”这样特殊的题材,也能写得如此熟稔、在行,不像其他台湾作品常有大陆读者一眼就能看出的破绽和隔膜,这是周啸虹的与众不同之处。

四、幽默风趣的艺术基调

读周啸虹的作品,总让人觉得生动有趣,可读性很强,这应归功于其创作中一种幽默的基调。他的作品,不少是回忆和书写早年的事情,一来这些事本身颇堪回味,更主要的则是作者以一种幽默风趣的笔调写出。幽默是一种站在看透世相的高度,以充满爱心的善意的“笑”来写出的文字。早年物质条件还比较落后,但人性、人情是一样的,甚至比现在还朴实淳厚,因此当年的事与现在的事相比较,充满了喜剧性。这种文

字既能引起人们的思古之幽情,也能剔透人情世相,对人性和人生有深刻的把握,其艺术性和特殊价值即在此。

周啸虹的幽默并非个别现象,而是出现于许多作品中,也不是一时的偶尔为之,而是数十年来一以贯之,成为一种基调,一种风格。如《宪兵球场杂忆》一文,写早年台北没有什么娱乐,最多只能晚上看场电影或篮球赛。有一次菲律宾华侨“黑白”篮球队来访,一下子卖了两千多张票,结果观众坐到球场内,怎么驱赶也只能清出排球场的大小,只好隔天再比赛,而且以比赛胜负进行有奖猜谜,结果两队 42:42 打平,竟然也有人猜中了。又如,周啸虹在 50 年代发表于军中刊物《革命文艺》上的《就训十记》,写的是军人训练之事,本应严肃古板、中规中矩,却写得非常幽默洒脱,甚至拿长官来开玩笑。这种幽默不是讽刺批判,而是带点苦中作乐的味道,虽然训练生活很苦,却能将其转化为快乐,这是一种比较正面、向上且总是心怀感恩的人生观所致。

这种幽默风趣的基调,主要来自两方面。一方面与细节和文字有关。周啸虹作品的文字、细节描写灵动而不死板,自然透出一种幽默感。再加上他博学多才,有时还引用古典诗歌、典雅文辞,雅俗碰撞,总能涉笔成趣。如他将操练和打仗用的枪称为“三〇小姐”,也曾描写了军营中抢菜吃的一幕——大家准备着,一声口号,筷子齐伸,一盘带点薄肉片的菜,已经见底。《就训十记》包括“入营记”、“出操记”、“上课记”、“庆生记”、“紧急集合记”、“过年记”、“晚会记”、“牙祭记”、“行军记”、“离营记”。随便拈出应是比较枯燥无趣的“上课记”,开头写道:“往常听人家说:‘文官讲堂,武官操场。’可是,年头变了,六十年风水轮流转,要造成文武合一,下马草檄,上马杀贼的好汉,就少不了要在讲堂上用功夫。说起来,大家都无所谓,同在学校里念书一样。”不过课堂上仍是状况频出:

大头今天刚从中山室借来《魂断江南》,正在聚精会神的“魂兮归来哀江南”。出名的胖子当然更不后人,加以这两天多吃了些肥肉,身体发福,一发福就倦,一倦就打瞌睡,再加上他的鼻子的构造与人不

同,少不得有点风箱声,风箱声一响,就难免引得别人注意。

……

不晓得什么时候,胖子的脑袋上,轻轻的弹落两个手指,大概胖兄好梦正圆,忘记了这是何处,“混——”下文未白,两眼一睁,班长的金鱼眼向他注视,一下子,吓走了睡神,吓出汗水,汗水像黄豆,从头上流下颈项,提起钢笔,不知道教官讲到什么地方了。

“魂断江南”正在上海保卫战,背后伸出值星官的手,轻轻的提去。

……

晚上,值星官宣布,各罚站卫兵一班,“唉!自作自受。”自己替自己下了评语。

应该说,这段描写的几个细节本身带有喜剧性,但令人哑然失笑的幽默效果更来自作者灵动有趣的文笔,像“文官讲堂,武官操场”等成语、俗话的采用,“班长的金鱼眼”之类的形容,将打鼾比喻为拉风箱等等,都增添了作品的谐趣。艰苦、严格的军营生活,在作者的妙笔点化下,通篇让读者发出忍俊不禁的笑声。

另一方面,也许更重要的是豁达、向上、快乐、积极的人生观和处世之道,或者说,幽默的词句也必须有作者自身的宽厚、包容、乐观的内在性情作为支撑,才能源源不断地涌流而出。周啸虹显然视生活本身为一种快乐,有一种历经战乱坎坷后安定下来的感恩和满足。即使有些似乎是麻烦讨厌的事,如《租房子》所写的租房搬家,也都被写得很有趣,原因就在于作者对人生怀有一种正确的态度——与世无争,安分守己,知足常乐,坚信“一支草,一点露”,从不怨天尤人、对社会满怀仇恨,而是随遇而安,扮演好自己的角色,于是一切都令人满足、有趣起来了。当然,幽默也许只是周啸虹艺术特色的一方面,但却是阅读他的一些作品后的第一个强烈的印象。

五、结语:缘于积极人生观的“正能量”书写

周啸虹的由不平凡的“日常”描绘、不一样的“乡土”抒写、与众不同的“两岸情”叙说和幽默风趣的艺术基调等所构成的独特的创作风格,归结

为一句话就是:缘于积极人生观的“正能量”书写。无论是作者笔下大量的笃定、坚强、踏实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各自人生道路上的普通“小人物”形象,或是靠自己锲而不舍的坚持和努力,终于能克服困难,获得好结果的乡土人物,以及分隔数十年后再次相聚的两岸同胞、亲友之间的相互包容、谅解和友爱,乃至源自作者的宽厚、善良的内在真性情的幽默基调,都说明了这一点。值得指出的是,周啸虹作品侧重于“正能量”的彰扬,但这并非出于某种政治的目的,或依附于某种宣传的需要,而是来自作者内心固有的对生活的热情和乐观态度,一种积极、向上的人生观。这成为周啸虹创作的显著特点,也是其作品最有价值的所在。

最后顺便指出的是,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,特别是文学史写作,总是在现代派、乡土派的框架中翻滚,太过集中于几位能够列入这一框架中的“大家”,而忽略还有其他很多有价值的作家作品,显露了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还存在许多盲点。周啸虹就是其中一位本不应该被忽视的台湾作家。虽然周啸虹的文学创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,当时正是“反共文艺”盛行之时,但正如本文探讨所显示的“反共”并非其创作的主流。我们并不否认当时有不少“反共文艺”的存在,但不能简单化地将所有作品都贴上“反共文学”的标签而弃之。当时有更大量的作品并不属于“反共文艺”的范畴。因此我们应该扩展视野,研究他们创作中有价值的部分,未来还有许多更全面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。这虽然已是题外话,但也是从周啸虹这一个案中,所可得到的启示。

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甲午战争以来台湾文学、文化与台湾民众认同问题研究”(13JJD810012)

注释:

[1]周啸虹:《三逢文抄公》、《迢递归乡路》,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02年9月,第206页。

作者朱双一,男,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、台湾研究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;肖魁伟,男,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